

制度对贸易影响的研究综述

——兼论“一带一路”实施中的制度红利

吴飞飞, 邱斌

(东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89)

摘要:文章梳理了“制度与贸易”主题下的重要研究文献,总结了代表性文献研究制度对贸易影响的主要视角及其研究成果,简要分析了地理与制度在贸易中作用的孰轻孰重问题,探讨了有关制度的工具变量选择问题,并穿插其中对“一带一路”实施中的制度红利问题进行了一定探讨,最后指出了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制度;制度质量;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地理

中图分类号:F7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097 (2016) 02-0052-04

Research Review on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 on Trade

——A Study on the Institutional Dividen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U Fei-fei, QIU B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important research literature under the theme of “institution and trade”, summarizes the main perspectives of representative literature in the study of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 on trade and its research findings, briefly analyzes the different roles played by 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 in trade, investigates the relevant instrumental variable selection of institution, and also carries on a certain discussion on the institutional dividen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inally, the paper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s of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institution; institution quality; international trade; comparative advantage; geography

近些年,在国际贸易领域研究中逐步重视制度因素的重要作用,而深入认识“制度与贸易”这一主题的相关研究成果对现阶段“一带一路”框架的构建和推进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基于此,本文详细梳理了“制度与贸易”的相关重要研究成果,并穿插其中兼论如何充分释放“一带一路”制度平台中的“制度红利”问题。

一、有关制度对贸易影响的研究兴起

自 North and Thomas (1973)^[1]、North (1981)^[2] 等提出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以后,制度对包括贸易在内的经济绩效影响逐步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Acemoglu (2008) 指出,经济学研究中的“制度”主要指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等要素产生激励影响的规则、规定、法律和政策^[3]。近些年,一些学者在国际贸易研究中逐步关注制度这一更根本的因素 (Angela, 2007)^[4],有关制度如何影

响贸易的研究开始逐步兴起。而相关文献从产权保护和合约实施这两个维度分析了制度对企业生产效率产生的影响 (Acemoglu et al, 2007^[5]; 金祥荣等, 2008^[6])。一方面,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能够为企业投资行为提供正向的激励,潜在的企业和在位的企业所形成的竞争效应将提升行业的平均生产效率;另一方面,有效的制度设计能够强化贸易双方的信任感并保证合约的顺利实施,降低贸易中的不安全性并减少可能的贸易摩擦和交易纠纷,而不良的制度安排将会增加贸易的交易成本,阻碍贸易行为的扩张 (De Groot, 2004)^[7]。Acemoglu et al. (2007) 指出,契约制度质量会影响企业的技术选择进而影响地区的比较优势形成,处在合约制度环境较差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简单的生产技术,而处在合约制度环境更好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更多的专用型投入 (进而生产技术密集型产品)^[5]。

收稿日期: 2015-05-3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5AJY001);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4EYA002); 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 (KYLX15_0196; KYZZ15_0070); 江苏省第四期 333 工程资助项目 ((2011) III-1905 号); 2015 年基本业务费省部基地开放课题立项项目 (2242015S30001; 2242015S30003; 2242015S30026; 2242015S30029)

作者简介: 吴飞飞 (1988-), 男, 安徽亳州人,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国际贸易;

邱斌 (1969-), 男, 安徽宿州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博士, 研究方向: 国际贸易。

制度影响贸易的内在机制主要是,制度质量为企业行为和贸易开展提供一种外在的约束环境或博弈规则,进而影响比较优势的塑造和贸易活动的展开。在“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更多的贸易行为由不同国家的企业来实现,制度平台的构建除了着力解决沿线各国的“设施联通”之外,各国“政策联通”和“民心联通”更为重要,只有减低企业之间的经贸往来和合作交流的相关交易成本,才能实现更为重要的“资金联通”和“贸易联通”,进而最大程度的释放“一带一路”实施中的制度红利。

二、关于制度对贸易影响的相关研究梳理

在国际贸易领域,现有文献在研究制度对贸易的影响时,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探讨,本文将对相关代表性文献进行一定的梳理。

(一)一国制度质量对该国贸易所产生的影响

诸多相关文献都是借助于引力模型来研究“制度与贸易”这一主题下的相关问题。这些研究成果可归纳为如下两点:第一,高质量的制度可以促进贸易的开展(Dollar & Kraay, 2003)^[8];第二,制度和贸易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Dollar & Kraay (2003)研究指出,高质量的制度会降低贸易成本和保障进出口企业的权益,进而促进国际贸易开展^[8]。

与引力模型中使用不同国家的整体制度差异来研究双边贸易不同,近些年的研究逐步关注一国的制度质量如何影响该国特定行业的出口比较优势塑造和形成。Levchenko (2007)研究指出,制度质量会影响一国不同行业的出口(进而影响该国的贸易模式),制度质量比技术和资本要素对一国复杂产品行业的生产和出口影响更大;制度质量的提升有助于促进契约依赖性高的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制度质量相对偏低的发展中国家在契约依赖性低的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更具有比较优势^[9]。Nunn and Trefler (2013)用合约制度作为国内制度的代理变量,研究得出制度因素会对国际贸易产生重要影响,国内制度水平的提升是一国塑造新的比较优势的重要可行途径之一^[10]。Levchenko (2013)也指出,良好的制度设计(包括合约执行力和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塑造新比较优势,且在技术水平相近的国家之间会存在改进制度的竞争关系^[11]。

“一带一路”实施后,特别是当沿线各国实现交通、能源、通讯网络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及加强海关合作和其他商业规范的多边合作后,将会为各国实现投资合作提供良好的外部支撑条件,大大促进双边投资贸易便利化,有效降低各类投资和贸易壁垒,这将为沿线区域内部和诸多国家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合作共建自由贸易区提供最为基础的外部条件,这也将有助于通过更多的合作和贸易来进一步释放“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中的制度红利。

(二)双边制度差距对贸易开展所产生的影响

制度差异将为贸易开展构筑的一种“距离”:不同于传统引力模型中的空间地理距离,不同国家之间的制度差异为双边贸易展开提供了一种直接影响交易能否顺利进行的无形“文化距离”。De Groot (2004)研究表明,制度距离会增加贸易成本,制度相近的国家更认同彼此的制度安排且更熟悉双方的商业运作方式,这将促进双边贸易开展^[7]。潘镇(2006)指出,出口国的制度质量提升会促进双边贸易开展,而制度距离会阻碍双边贸易开展^[12]。黄新飞等(2013)比较了制度距离与跨国收入差距后,研究得出制度距离是造成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更根本性因素^[13]。

可见,制度差距是影响双边经济发展差距或贸易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而“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将为自然条件、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存在显著差异的沿线各国在局部范围内提供一个缩减双边制度差距的外在框架和合作机制。例如,“一带一路”十分强调“强化多边合作机制作用”,即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10+1”等现存的多边合作机制来引导参与国加强合作和交流,在求同存异的理念下削弱制约双边开展合作和贸易的各类无形和人为壁垒,这将有助于从制度层面来兑现双边或多边存在合作潜力,进而开创新型合作机制并探索新时期经济发展的新型动力。

(三)一国内部不同区域制度环境差异对贸易所产生的差异化影响

在探讨了跨国之间的制度差异对贸易产生的影响后,令人感兴趣的是,一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制度差异又是如何影响各自区域的对外贸易发展呢?这首先需要回答为什么同一国家的不同区域存在不同的制度环境。方颖和赵扬(2011)对此给予了很好的诠释,以中国为例,尽管不同区域(或各个省市)遵从统一的法律体系和实行共同的市场经济制度,但是由于不同地区在文化习俗和传统规范等非正规约束上存在明显的差异以及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的存在,将使得不同区域在实施和执行具体制度时存在实施强度的差异,这将最终导致不同区域的制度质量存在显著性的差异^[14]。

金荣祥等(2008)从制度层面(产权保护和契约实施)研究了地方制度质量差异对企业生产率和地区出口差异形成的微观机制,研究得出,法律制度和产权保护等制度因素对地区出口差异具有显著影响,且敏感程度超过地理因素和外资分布差异等因素^[6]。Feenstra et al (2012)在研究制度质量对中国各省份出口模式的影响时也得出,制度质量能够一定程度解释中国各个省份出口模式存在的差异,且制度质量对更加依赖合约执行力的贸易模式(主要是

指加工贸易和外资企业出口这类)形成更为重要^[15]。

(四)特定的制度安排对贸易所产生的影响

由于制度是一种内涵广泛的约束体系,从一国整体层面来考察制度对贸易的影响机制是很难阐述明了的,将制度进行分离来考察特定的制度安排对贸易的影响更易说明其中的内在作用机制并进行经验分析。此外,制度质量的测度依赖于对制度体系的界定,而制度体系界定的优劣、制度质量测度的准确与否会直接影响相关实证检验的可行性,这也使得更多研究选择考察特定的制度安排对贸易的影响。

从金融制度的视角来看,Chaney(2013)指出,金融发展影响国际贸易流量的微观机制为金融约束和生产率水平是企业能否出口的“二元异质性”^[16]。从合约执行力以及法制水平等制度因素来看,Nunn(2007)还指出合约执行力比实物资本和熟练劳动力对国际贸易模式形成更具解释力,完善的合约及其执行效率(良好的合约实施制度环境)能够有效降低特定关系型行业(契约密集型行业)的制度成本,进而形成这些行业出口比较优势^[17];Levchenko(2007)则指出较高的法制水平有助于保障合同的执行力,进而能促进存在合同摩擦和具有“锁定”属性行业的对外出口^[9]。孙少勤等(2014)研究指出,法制建设强度提升有助于中国制造业的总体出口,目前中国法制建设强度只能促进对制度依赖程度较低的异质性行业的出口,而未能促进较高制度依赖性行业的出口^[18]。邱斌等(2014)指出,在一国的制度质量越过“制度门槛”后,该国的制度因素与行业特征的协同效应有利于该国对外出口;出口国的制度质量优于进口国时,该国制度因素与行业特征的协同效应能够促进其对进口国的出口^[19]。

现有的研究表明,即使遵循共同的法律体系和拥有共同的文化遗产的一个国家的内部各个区域仍存在显著的制度差异(主要表现制度实施强度或制度实施效率的差异),更何况“一带一路”实施中的沿线各国存在的制度差异呢?可以预见,克服“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制度差异为多双边投资合作和贸易往来带来的障碍和壁垒必将是任重道远的历程。在这一情况下,沿线各国要坚持制度层面的求同存异理念,努力探求双方合作的利益共同点和价值联动物体,加强各种沟通并扩大合作的空间和范围,利用已有的合作来挖掘潜在的合作方向,逐步强化双多边的合作契合点和寻找多边合作最大合约数。

三、寻找制度的工具变量

正如Acemoglu(2012)所指出,制度变量一般是内生的,制度和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20]。现有文献主要是从地理和历史两个角度出发寻找制度的工具变量。而相关文献考察一国制度的优劣大都是与殖民传统或受西方的影响紧密联系在一起,

寻找能够反映殖民者或西方国家对当地历史影响程度的代理变量则成为寻找制度的工具变量的基本途径。把握住制度的工具变量的“相关性”相对容易,但把握制度的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则相对不易。Easterly & Levine(2003)把纬度、粮食和矿产资源禀赋等指标作为制度的工具变量^[21]。一些研究认为,各国到赤道的距离与气候和地理因素相关,而后者又会影响当代农业发展,从而所选取的工具变量不符合“外生性”假定。Acemoglu(2001)也对地理作为制度的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提出批评,因为地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能不局限于通过制度而发生作用,也会通过影响气候、要素聚集、贸易政策等而影响经济绩效^[22]。本着从历史角度出发,Acemoglu et al(2001)则巧妙地选择早期欧洲殖民者在各个殖民地的死亡率作为制度的工具变量,因为早期殖民者在当地所建立的政府类型深受殖民者早期在当地的死亡率影响。如果死亡率较高,殖民者会倾向于建立掠夺性的政府以将该地区资源转移至本国(劣等的制度);反之,如果死亡率较低,殖民者会倾向于向该地区移民并建立效仿本国的制度(优良的制度)。由于制度的历史延续性,使得这些独立后的国家仍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原先的制度^[22]。但是,该工具变量仍难满足“外生性”假设,因为早期殖民者在当地的死亡率可能与当时的流行疾病的分布有关,而地理性的流行疾病分布以及初始人力资本均能决定经济发展的不同路径。邵军、徐康宁(2008)选择了法律体系族源和使用欧洲主要语言人口比重作为各国制度质量的工具变量,其实质从历史视角选择反映历史特征的要素(殖民传统相关的信息)并借助“制度的历史延续性”特征来寻找到制度的工具变量^[23]。Tabellini(2010)则选择在19世纪末的识字率以及过去几个世纪的政治制度作为欧洲各国当前制度的工具变量^[24]。也是从“寻找一国制度受西方影响程度的代理变量”这一历史视角出发,方颖和赵扬(2011)以1919年各城市基督教教会初级小学注册人数占当地人口的比重构建了中国47个地级市层面的制度质量(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工具变量^[14];董志强等(2012)则选择省会城市开埠通商的历史长度作为中国30个省份制度软环境(营商环境)的工具变量^[25];黄新飞(2013)选择跨国之间的遗传距离作为各国制度质量差异的工具变量^[13]。

四、地理与制度对贸易影响的孰轻孰重问题

关于制度与地理两者在贸易中作用的孰轻孰重问题在学术界也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国际贸易领域中,“引力模型”的不断发展并广泛使用更是说明了地理因素在国家之间开展双边或多边贸易的重要性(Eaton & Kortum, 2002)^[26]。Acemoglu & Robinson(2008)则强调是制度因素而不是地理因素导致了不

同国家的经济绩效差异,其原因在于制度构建了经济中核心要素的各类激励,对物质和人力资本、技术、组织等要素产生重要影响^[3]。现在更多的研究表明,地理、贸易、政策等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大都是通过影响制度这一因素来发挥作用的,制度的差异才是跨国差异形成的更深层次原因(杨汝岱, 2008)^[27]。上述不同的观点构建了各自的理论依据,而在未来较长的时间内,关于制度与地理在贸易中的孰轻孰重问题一直都会是国际贸易研究中争论性话题之一。

可以肯定的是,地理和制度都是影响贸易开展的极为重要的基本因素。“一带一路”实施的重大意义在于,它在既定的空间地理约束下显著降低了沿线各国的地理因素对双多边贸易开展所带来的空间壁垒,努力在最大程度上降低多双边贸易中的制度壁垒,并在多双边合作中逐步探求构建制度优势的可能性。这些努力必将有助于在最大程度上通过优越的制度平台的倡导和良好的外部条件的支撑来兑现多双边的合作潜力,共享互利互惠的经济发展新模式。

五、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关于“制度与贸易”主题的进一步研究方向有如下几方面:第一,更加清晰准确地界定制度体系或制度质量的内涵和外延,并构建内涵更为丰富的制度体系来更加精确地衡量被考察层面(尤其是一国内部不同区域层面)的制度指标;第二,深入研究一国范围内区域层面的制度差距如何影响对外出口贸易模式;第三,随着微观层面的数据逐渐丰富且获取难度逐步降低,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到微观层面来考察制度对贸易的影响;第四,综合考量制度因素如何塑造为一种特定的比较优势进而为一国出口提供新型动力源泉。

“一带一路”的实施对于相关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提出了极为迫切的现实诉求,尽管现有的研究能够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提供较为充分的理论和实践参考,但充分释放“一带一路”实施中的制度红利仍然需要更多的针对性研究,这是我国经济学家在未来一个较长时间内在进行“制度与贸易”研究时需要谨慎考虑的重要现实问题,同时这也是未来政策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参考文献:

- [1] North D C, Thomas R. P.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 [2] North D C.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M]. New York: New York Norton, 1981.
- [3] Acemoglu D, Robinson J. Persistence of Power, Elites, and Institution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8, 98(1): 267-293.
- [4] Angela C.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s[J].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2007, 15(2): 211-255.
- [5] Acemoglu D, Paul Antra, Helpman E. Contract and Technology Adopt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7, 97: 916-943.
- [6] 金祥荣, 茹玉聪, 吴宏. 制度、企业生产效率与中国地区间出口差异[J]. 管理世界, 2008(11): 65-77.
- [7] De Groot H, Linders G M, Rietveld U, et al. The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Bilateral Trade Patterns[J]. Kyklos, 2004, 57(1): 143-157.
- [8] Dollar A Kraay. Institutions, Trade and Growth[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03, 50: 133-162.
- [9] Levchenko A A.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7, 74(3): 791-819.
- [10] Nunn N, Treffer D. Domestic Institutions as a Source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R]. NBER Working Paper, 2013.
- [11] Levchenko A A.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J].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 Organization, 2013, 29(5): 1145-1181.
- [12] 潘镇. 制度质量、制度距离与双边贸易[J]. 中国工业经济, 2006(7): 45-52.
- [13] 黄新飞, 舒元, 徐裕敏. 制度距离与跨国收入差距[J]. 经济研究, 2013(9): 4-16.
- [14] 方颖, 赵扬. 寻找制度的工具变量: 估计产权保护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J]. 经济研究, 2011(5): 138-148.
- [15] Freestra R C, Hong C, Ma H, et al. Contractual versus Non-contractual Trade: The Role of Institution in China[R]. NBER Working Paper, 2012.
- [16] Chaney T. Liquidity Constrained Exporters[R]. NBER Working Paper, 2013.
- [17] Nunn N. Relationship-specificity, Incomplete Contracts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7, 122(2): 569-600.
- [18] 孙少勤, 邱斌, 唐保庆. 法制建设强度与中国制造业出口动力新源泉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4(7): 84-95.
- [19] 邱斌, 唐保庆, 孙少勤, 等. 要素禀赋、制度红利与新型出口比较优势[J]. 经济研究, 2014(8): 107-119.
- [20] Acemoglu D, Robinson J, Verdier T. Can't We All Be More Like Scandinavians? Asymmetric Growth and Institutions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R]. NBER Working Paper, No.18441, 2012.
- [21] Easterly W, Levine R. Tropics, Germs, and Crops: How Endowments Influence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03, 50: 3-39.
- [22] Acemoglu D, Johnson S, Robinson J.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91: 1369-1401.
- [23] 邵军, 徐康宁. 制度质量、外资进入与增长效应: 一个跨国的经验研究[J]. 世界经济, 2008(7): 3-14.
- [24] Tabellini G.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s of Europe[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10, 52(6): 23-72.
- [25] 董志强, 魏下海, 苏灿晴. 制度软环境与经济发展[J]. 管理世界, 2012(4): 9-20.
- [26] Eaton B, Kortum S. Technology, Geography and Trade[J]. Econometrica, 2002, 70: 1741-1779.
- [27] 杨汝岱. 制度与发展: 中国的实践[J]. 管理世界, 2008(7): 151-159.

[责任编辑: 余志虎]

人力资本结构、技术进步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中国2002-2013年30个省区面板数据的分析

马磊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文章借鉴Acemoglu建立的CES生产函数,构建城乡收入差距与人力资本结构、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函数,将城乡人力资本结构、技术进步引入城乡收入差距分析框架中,并使用中国30个省区2002-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与分析,发现人力资本结构与技术进步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缩减作用,提高大专及以上学历从业人员的相对比重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尤其对中西部地区的作用更加显著。基于实证检验与研究结论,为城乡收入差距的调节与缩小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关键词:人力资本结构;技术进步;城乡收入差距

中图分类号:F124; F1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097(2016)02-0056-08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Technical Progress and Urban-rural Income Inequality —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02 to 2013

MA Lei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relationship model of urban-rural income inequality,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and technical progress drawing on CES production function established by Acemoglu, and incorporates urban-rural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and technical progress into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urban-rural income inequality, and empirically tests and analyzes the model by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02 to 2013. The study shows that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and technical progress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urban-rural income inequality, which means that increasing the relative proportion of employees with college degree or above and improving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re conducive to reducing urban-rural income inequality, especially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areas. The paper proposes corresponding policy suggestions to regulate and reduce the urban-rural income inequality based on the empirical test and research conclusions.

Keywords: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technical progress; urban-rural income inequality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GDP年均增长率超过9%的中国速度。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我国各个地区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持续扩大,特别是在1985年改革触角自农村向城市延伸后,居民地区收入差距呈现阶梯上升态势(高连水,2011)^[1]。研究人员通过对居民地区收入差距的分解分析,发现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最主要的是来源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对地区间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度在40%以上(李实,2010;周云波、高连水、武鹏,2010)^[2-3]。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呈现

逐步上升的变化趋势,如图1和图2所示。不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成为我国收入分配改革领域中的主要难题与障碍,如果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地区收入差距也将随之加剧。因此,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与影响因素展开分析,有助于把握城乡收入差距的内在机制,进而调节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形成与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国内外学者从政府发展战略(陈斌开、林毅夫,2013)^[4]、城市化(王子敏,2011;陈斌开等,2013)^[4-5]、政府支出结构(王艺明,2010;钱争鸣等,2012)^[6-7]、转移支付(胡宝娣,2011;余菊等,2014)^[8-9]、财政分权(陈工等,2012)^[10]、开放经济(王海军,2010;阚大学

收稿日期:2015-02-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3&ZD031)

作者简介:马磊(1985-),男,山东聊城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经济学理论与政策。